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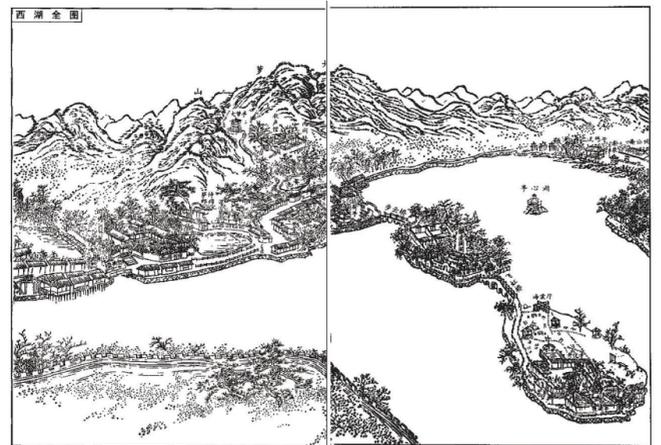
读史阅世

艺苑大观

清道光年间重浚西湖起风波

□本报记者 谢海潮 文/图

林则徐疏浚西湖的功绩,诚如谢章铤所述:“福州西湖,历代皆有修浚,本朝以林文忠为尤著。文忠以闽人治闽事,利弊了然,故成功久而固。”然而,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,阻力主要来自沿湖的豪右,他们出于私利遂构蜚语,甚至倒打一耙,贿通闽县知县张腾诬告林则徐以公谋私……



何振岱《西湖志》之“西湖全图”

丁忧期间出山

福州西湖曾经“大之至四十余里”,至清代“道光初丈量,只有七里”(郭白阳《竹间续话》)。按照康熙以后的惯例,西湖“每届四十年一修,皆动帑办理”。自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总督福康安、巡抚徐嗣曾重浚,至道光八年(1828年)恰隔40年,当时的状况是“山水冲激,湖身淤垫”。

沿湖土豪奸民一系列劣行径又加剧恶化,“沿湖小民贪图小利,仍将岸上积土推入湖中,围作田园,占为己业”(林则徐《清厘福州小西湖界址告示》)。“北阘每被土豪朋奸私放湖水,浅种菱菜,收采之后,败根烂叶,壅积成泥,填淤日深,农田日涸”(陈寿祺《答陆菜臧县尹论福州水利书》),造成“地隘无以容水,故春夏巨浸滔天,秋冬涸不及蹠。旱潦俱无所资,委良田于草莽,而民生愈蹙矣”(谢章铤《赌棋山庄笔记》)。

道光七年(1827年)五月初一日,林则徐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,闰五月初三日到任,不久擢升为江宁布政使。在等候继任时,他派人迎父到新任所。林寅日携眷自福州至南京途中,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浙江衢州。



孙尔准像

十月十九日,林则徐闻父卒讯,南归奔丧。十二月初八日,抵衢州,奉灵车返籍。道光八年正月抵家在籍守制,住在离西湖不远的文藻山。

根据茅林立《林则徐修浚福州西湖的史实澄清》所述,西湖修浚前曾在士绅中广泛征求意见,大家认为修浚不能再缓。参见时任闽浙总督孙尔准、福建巡抚韩克均《请动项续修小西湖摺》,工程原由程含章主办,福州府督同履勘,但于道光八年九月升任福建布政使的程含章,十一月二十六日才莅任,又于道光九年(1829年)因病陈请开缺。在道光八年十一月趁枯水期兴工且藩司不在位的情况下,修浚西湖的使命自然落到在籍守制的林则徐身上,毕竟他曾经奉旨总办江、浙七府水利,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。

张腾勒索票汗

“从前湖宽之时,水中所产,日可值数十金”,“至水中栽种菱角、菘菜,其值尤微,而壅塞湖身,莫此为甚;且有偷放湖水以种菱而不顾农田之涸者,其居心尤属可恶”,林则徐出于“岂忍纵豪右之并兼,而致良农之坐困”的公心,要求沿湖居民将所占之地“缴出归官”。

其中一大举措便是将湖旁土岸“围砌石岸,以杜占垦”。客居福州的晋江人杨浚说,林公“于清复湖址尤为认真,而西北乡民以公强正廉明,不便于己,遂构蜚语;有忌公者,据以上闻”。有忌公者,据以上闻,当指道光九年八月初八日,张腾向孙尔准等人递禀帖一事。

据《孙文靖(尔准)年谱》道光九年

条所述,“府君于戊子(1828年)之冬查核历修成案,委福州府偕委员履勘丈量,会同绅士分段办理计方挑土,毫无浮费,周围筑筑堤以清界址,兴挑及半,适闽县知县张腾勒索票汗,妄指为无关水利农田。议者谓此事即交两司提问可以消弭,而府君毅然奏请钦派大臣来闽审办”。

张腾拼凑编造了什么?杨国楨《林则徐大传》“重浚小西湖,雅集龙树院”一节有详细记述。禀帖诬指西湖疏浚是未经审批的项目,是滥用公帑修建“游玩之所”,“以多年久经入库之正款,忽而抽取万有金,既不咨部,又不具奏,徒以粉饰耳目之费,厚酬其(林则徐)平日奉迎效顺之德”,“且小西湖一游玩之所,一府两县随时皆可料理,何必陆我嵩始充总理,亦何须在籍之二品大员(林则徐)始充包办哉”。

至于林则徐的“罪名”,一是以公谋私、任用亲家,“藉农田水利之美名,为亲家保升之具”,“林则徐与陆我嵩始为密友,继成至戚,乃会垣巨族,亲戚朋友遍居城乡,若南台一缺,竟委陆我嵩接署”;二是谄媚现任督抚,为其营建生祠。

这番“勒索票汗”自然皆是不实之词。浚湖是督抚的决策,请来林则徐“总其事”,还委任福州海防同知陆我嵩(《西湖志》引文云“字‘菜臧’”)等人分任其事。所建“褒忠祠”,是为清康熙年间殉难总督范承谟等人建的专祠,并非为现任督抚建生祠。虽是姨表兄弟,后来又成儿女亲家,林则徐“亦无为陆我嵩屈膝求缺情事”。

之所以“毅然奏请钦派大臣来闽审办”,是禀帖还涉及督抚丁门收受门

包银、库款盈余银两未经报部等指控,孙尔准瓜田李下只得避嫌。

文忠声誉转起

朝廷委派礼部尚书汤金钊、刑部右侍郎钟昌到福建查办,结果“所汗毫无实据,履勘小西湖,实系有益农田水利应修之工。复奏得旨,坐诬诬者如律,小西湖工程续修”。

不过,孙尔准、韩克均、程含章三人还是获谴“降二级留任”。处分也是事出有因。福州西湖修浚是在莆田木兰陂修复、福州贡院扩建等工程之后发起的,其中未照例详奏库款盈余是个罪名。从林则徐《孙平叔(尔准)官保六十寿序》等文献中,茅林立推论:修浚西湖工程应该最初未报告朝廷,是挪用库款的,因为考虑不周,引出此番波折。

两处门丁得银的指控也坐实了督抚俱坐失察议处。然而,门丁收受的“各两次”,“计每处八十八两”红包,实际上就是张腾送的,其逆冀挑事的动机是因“短交前任交代案内捐什各款银谷”被参,“希图挟制”。据民国版《闽侯县志·职官五·闽县》记载,张腾(道光三年(1823年)任),陆我嵩(道光五年(1825年)权任(暂任)),两人系前前任,张腾因款项不明,公报私怨。

道光十年(1830年)正月十八日,道光帝以张腾“肆行诬讦上司,意图挟制,又以毫无影响之言,污蔑在籍大员名节,此等刁风断不可长”,将之发往军台效力赎罪。

道光十年七月,孙、韩奏请动项续修,未批时间为七月二十九日。而在当年的正月,林则徐守丧期满除服,四月初抵达苏州,离家的时间应是三月初。茅林立认为,林则徐实际上主持西湖修浚的前半段。从经费看,修浚工程预算一万八千两,大头是国家支出,“尚不敷银三千八百余两”由孙尔准、韩克均等人“率属匀捐”,林则徐用银八千五百五十九两。

风波过后,结论是西湖应修,各大员有过失,林则徐是清白的。其清廉和持重在事件中得以凸显,“一无影响,而文忠声誉转起”。但流言也给林则徐留下心理阴影,他致信费丙章:“侍里居殊烦苦,一切碌碌,自当不肯逾尺寸界限,然周旋之间亦大费神,甚为不值。此惟阅历深者乃悉此曲衷也。”在居家与出山之间犹豫,他还都是选择了出山,直至“歿于王命”。

“修浚福州西湖在林则徐一生中不算大工程,但这一事件留下的精神、人文财富是值得发扬光大的。”茅林立说,即使居家,林则徐也没有一刻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。



《孙中山全身像》

吴楚山:中国金漆画首创者

□涂建元 文/图

民国时期,诏安县旅泰华侨吴楚山因独创的播金漆画而享誉海内外。随着岁月流逝,这位著名的金漆画家却逐渐被人淡忘。近期,吴楚山博士的两幅金漆画原作《孙中山全身像》和《双大象图》相继在东南亚被发现,再次引发世人关注。

吴楚山一生的艺术创作大多在泰国。在泰国福建会馆发现的《孙中山全身像》,左下侧署有“漳州吴楚山敬献”隶书字样,画面人物孙中山神采奕奕,迎着朝阳,金光灿烂,确如《诏安县志》所载:“以金银粉涂于亮部,图像金碧辉煌。”据《诏安吴氏通史》记载:孙中山逝世后,吴楚山出于对国父的尊崇,以其精湛的技艺,精心绘制巨幅金漆画像,赠送南京中山陵。

另由东南亚华侨发现的《双大象图》,左上侧署有“己巳年五月漳州吴楚山作于岭南六塔古寺千佛塔下”行书字样,该画作于民国十八年(1929年),比绘制孙中山画像赠送南京中山陵的时间稍早。

从其后人处还发现吴楚山金漆《自画像》(创作于1931年)。该画是黑漆底金粉画,画中的吴楚山西装革履,头发光亮,两鬓微白,戴着金丝眼镜,侧坐在交椅上跷着二郎腿,脸部表情轻松儒雅,左胸戴三个徽章,据其孙子吴阿森回忆,分别是国民政府颁发的世界发明奖、金漆画家和博士徽章。画面上部的题款写着:“吴楚山以金漆画总理遗像见赠,画呈取法西,而应用金漆仍然成祖国之粹,特给此证以作纪念。”题签为国民会议主席团张学良等8名成员,时间署“中华民国廿年(1931年)五月十七日”。

吴楚山一生经历颇具传奇。1873年,他生于诏安县西潭村(现西潭镇潭光村),从小聪慧过人,经常在田间用泥土很快就捏出各种动物和人物,又爱好绘画,不断地模仿练笔。青年时期迫于生计,他漂洋过海去泰国谋生,刻苦自学泥塑、雕刻之艺,后来更是融会贯通地将西洋油画与中国漆熔于一炉。

中国民间传统漆画工艺大多是在木制家具器皿上施漆作画,而吴楚山敢于突破传统,勇于创新,以白布代木材进行创作。他的金漆画以中国传统工笔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等为基础,吸收西洋的画法和技法,以建漆为底施于布,于将干未干之时,用金粉调松脂精雕刻。漆画受气候影响颇大,吴楚山凭多年实践经验,终于形成别具一格的金漆画派,以熠熠生辉、金碧辉煌、别具风采著称,且不惧风雨剥蚀,色泽经久不衰。

吴楚山一生热爱祖国,不忘家



吴楚山《自画像》



《双大象图》

乡。抗战期间,他创作了金漆画《苏武牧羊图》呈送国民政府,以画明志,表达了坚守民族气节的拳拳之心,以画激励坚持抗战的军民,反对亲日投降派。1947年初,古稀之年的吴楚山思乡心切,回国定居。他热心公益,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捐款办学,虽然家道殷实,仍住旧房,并未大兴土木盖大厝、建洋楼。

在家乡有一子名吴冷,亦是漳州知名画家,常居乡城及石码作画。1947年4月10日,吴冷因意外不治身亡,时年40岁。吴大师全部技艺要传给儿子的计划落空,他悲痛欲绝,身心受到极大刺激,于1950年2月16日病逝于家中,享年78岁,原葬于西潭文定山,后因开路迁移至酒瓮山,与其子吴冷墓合葬,墓碑已遗失。

说史谈屑

福州与“漆”的不解之缘

□张小燕 杨惠茗 文/图



南宋剔犀三层盒

福州是福州特色漆器髹饰工艺之一,指的是福州剔犀工艺以及使用剔犀制作而成的漆器。剔犀是大漆中的一种装饰工艺,隶属于雕漆。《髹饰录》中有关于剔犀的详尽记录:“剔犀,有朱面,有黑面,有透明紫面。或乌间朱线,或红间黑带,或雕雕等复,或三色更叠。其文皆疏刻剑环、绦环、重圈、回文、云钩之类。”福州剔犀使用木胎、金银胎或脱胎为胎体,之后选用两三种色漆,在漆胎上反复髹涂几十上百遍,直至积累一定的厚度。待漆干半干后,使用V型刻刀雕刻上回纹、卷草、云钩等图案,之后进行打磨、抛光等操作。由于每层髹涂的漆颜色不同,刻刀雕刻出的横截面也间杂不同的色彩,层层叠叠。

所谓“仿自犀牛角之纹”,意思是剔犀花纹繁复,如同犀牛角横截面的肌理效果,这也是剔犀名字的来源。除字

面含义外,福州也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。“福”即是福州,同时也代表了幸福、福运。“犀”取自犀牛,犀牛自古以来便是祥瑞的化身,被人们赋予了聪慧、力量的寓意。因此,福州是美好寓意的积累,与福州的福文化不谋而合。

相比于平面漆绘,福州并没有雕刻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繁复华丽的花纹,更多是强调立体的视觉感受,漆器表面凹凸有致,刀口断面清晰,刀锋平滑有力,通体呈古朴、典雅之态势。福州是对工匠刀工的考验,雕刻讲究一个“快”字,下刀前需要提前做好雕刻的内容,下刀时手要稳,雕刻的纹路需平滑。《髹饰录》专门将雕刻的过失总结为“骨瘦、玷缺、锋痕”等。骨瘦是指雕刻的漆过多,导致表面漆层过“瘦”;

玷缺则是因刀法不够锋利,导致刻出的花纹不够利落;锋痕是因用刀没有留意,在不该有刻痕的地方出现了刀痕。一旦手法不够娴熟,雕刻出现了疵漏,整件漆器可能都需要推倒重做,很难进行补救。因此,制作剔犀的工匠往往需要大量制作经验的积累,唯有手熟,才能“下刀如有神”。

福州是伴随着福州的地域文化不断发展的。“福犀”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曹昭的《格古要论》,其中记载:“福州旧作色黄滑地圆花儿者,多谓之为犀犀,且厚,亦难得。”指的是宋代至明清时福州本地制作的剔犀漆器。1986年在福州市北郊茶园村墓出土的剔犀三层漆盒,是国内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剔犀漆器,因此宋代是福州剔犀漆器萌芽的开端。随着宋代皇室的迁都,中原地区的手工艺等产业也迁移到南方地区,得益于福州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宋代优厚的手工艺发展政策,为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,福州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根发芽,工艺得到迅速提升。宋熙宁年间,官府在福州设立专门的漆器作坊,制作以福犀为主的漆器。

明清时期是福州漆艺又一个发展高峰,福州在工艺品中颇具盛名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写道:“游八闽之为雕漆,数百年于兹矣。四方之购此者,亦百千万亿其人矣……工师为谁?魏姓,字兰如;王姓,字孟明。闽省雕漆之佳,当推二人第一。”说明明清福州雕漆工艺已炉火纯青,并诞生了一批漆器制作名匠。这一时期受皇室贵族盛名的影响,福州漆器器型较大,胎体由木胎转为使用瓷胎,纹饰也更加华丽复杂。

清末时期,出现了“漆冻脱模”工艺,急剧下降了漆器的制作成本,传统的剔犀漆器的市场被抢占,加之福州脱胎漆器崛起,逐渐成为福州的新兴漆器代表,自此福州的漆器产品以福州脱胎漆器为主,福犀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复兴福犀工艺,不仅是对一项传统工艺的保护,同时对留存福州地域文化、唤起福州人的乡土情结也有着重要作用。从古至今,福州与“漆”便有着不解之缘。在福州民间,不论生老病死,抑或婚嫁嫁娶,各类仪式都流行着使用漆器的习俗。